

报国

回忆我所采访的科学大家

顾迈男一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毛泽东与林一山谈三峡工程和南水北调 邓小平与2011年科教座谈会 忆胡耀邦同志二三事 我所知道的方毅 忆采访李政道教授 忆对杨振宁教授的采访 忆跨国采访《丁肇中》一书的往事 郭沫若的豪爽和李四光的严谨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先驱——访梁思成教授 我为什么撰写《华罗庚传》 难以忘却的一段采访经历——忆数学家陈景润 记饱经忧患的著名核物理学家王淦昌 他用自己的智慧和心血圆了一个梦——记著名物理学家朱光亚 突破「禁区」采访邓稼先……



报国

回忆我所采访的科学大家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报国:回忆我所采访的科学大家/顾迈男著.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1

ISBN 978-7-5098-0854-2

I. ①报… II. ①顾… III. ①华人—科学家—访问记—世界
IV. ①K816.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1979 号

责任编辑:姚建萍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6号院1号楼

邮 编:100080

网 址:www. dscbs. 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密兴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162mm×235mm 1/16

字 数:175 千字

印 张:12

印 数:1—4000 册

版 次: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98-0854-2

定 价:22. 00 元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业务部联系
电话:010—82517687

目 录

CONTENTS

1	我的记者生涯
12	毛泽东与林一山谈三峡工程和南水北调
29	邓小平与1977年科教座谈会
40	忆胡耀邦同志二三事
45	我所知道的方毅
55	忆采访李政道教授
67	忆对杨振宁教授的采访
77	忆跨国采写《丁肇中》一书的往事
93	郭沫若的豪爽和李四光的严谨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100	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先驱——访梁思成教授
117	我为什么撰写《华罗庚传》
126	难以忘却的一段采访经历——忆数学家陈景润
135	记饱经忧患的著名核物理学家王淦昌
144	他用自己的智慧和心血圆了一个梦——记著名物理学家朱光亚
154	突破“禁区”采访邓稼先
166	不辞沉默铸坚甲——记核科学家陈能宽
174	中国原子弹靶场选址前后

180	⋮	中国首次核试验44周年记
186	⋮	后 记

1. 我的记者生涯

在数十年的岁月里，我是怎样比较成功地采访和报道那些蜚声国内外的大科学家的呢？在采访写作过程中，我处处以科学家为师，虚心向他们求教，同他们合作……

在人生的旅途中，青年时代的立志是很重要的。立志，从某种意义上就是要有梦想。志向（或是梦想）确立以后，就应朝着志向或梦想去奋斗。经过无数次的挫折、失败、成功，尤其是执著的不畏艰险的追求，最后圆了自己的梦。

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梦想，有人梦想成为一名科学家，有人梦想成为一名政治家，还有人梦想成为实业家，也有人梦想成为一位作家或是记者。我年轻时的梦想就是想当记者。现在可以说，在人生的旅途中，我用毕生的精力、智慧和汗水，圆了自己当初的梦。

作为记者的我，采访对象并不是一般的劳动者，他们大多是高等学府毕业、吃过洋面包、学识渊博、学有专长的人。其中不少人是拥有博士、硕士学位，甚至是戴着诺贝尔奖光环的大科学家。那么，我这个才疏学浅的记者，在数十年的漫长岁月里，是怎样比较成功地采访这些大科学家，又是怎样报道他们的呢？回顾我走过的道路，再次验证了“有志者事竟成”这句至理名言。在采访写作过程中，我始终甘当小学生，处处以科学家为师，虚心地向他们学习、求教，同他们合作，如果时间来得及，稿件写成以后，一定要送给他们审阅修改，事实证明，这样做不仅体现了对采访对象

的尊重，而且避免出现讲外行话等错误。

那是1962年秋天的一个夜晚，我趁着与值班社长朱穆之同志一起上夜班的机会，敞开了自己的心扉。当时，已经快到下班的时间，朱穆之同志从办公室走出来，到我们秘书办公室来翻看报架上的地方报纸，我鼓起勇气走到他的身旁，对他说：“穆之同志，我已经29岁了，我很想到国内部当个记者！”

“噢，我给你问问，看看人家要不要你！”他听了毫不犹豫地说。

朱穆之同志原名朱仲龙，早在北京大学读书时，他就是爱国学生的领袖，在著名的一二九运动中，曾冒着生命危险和国民党军警争夺水龙头，参加革命后，转战在太行山中，是邓小平同志的得意部下，他为人宽厚，乐于提携年轻人，因此，在众多的社长中，我决定向他求助。过了两三天，一天，刚上班，朱穆之同志便笑吟吟地对我说：“小顾，我给你问了，方实（当时国内部负责人）他们要你！”

听了朱穆之同志的话，我不禁又喜又忧，便有些忐忑不安地说：“呀，穆之同志，到了国内部，我要是干不了可怎么办呢？”

在那个永远铭刻在我记忆中的夜晚，朱穆之同志讲了一句使我终生难忘的话，他说：“嗯，要是干不了，就再回来吧！”

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后，朱穆之同志曾任中宣部和文化部的负责人，我就这样带着这位新闻界老前辈的厚望，走进了新华社国内新闻编辑部文教组的办公室。

来到编辑部，接待我的是当时国内部副主任兼文教组组长方实（方实，原名叶笃成，是著名民主人士叶笃义、著名大气物理学家叶笃正的弟弟。他早在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时，就是学生运动中的风云人物）和副组长方言（方言也是很有才气的编辑，颇有安徽桐城派的遗风，是一位严厉的伯乐，在业务方面，他是我的顶头上司）。

寒暄过后，方实、方言找我谈话时，问道：“你想当体育记者，还是想当科学记者？”

“当科学记者！”我毫不犹豫地说。

在这之前，我看了许多科学家的传记，居里夫人、牛顿、爱迪生等科

学家的传奇经历和他们对人类的贡献，很吸引我。

“那好。”他们当即同意了我的要求。

在这之后，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便成了个自由人。平时，我除了报选题、交稿子去编辑部外，其余时间，就深入到我的领地：一是北京的三里河（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所在地）；再就是北京西郊的中关村一带（中国科学院所属各个研究所的所在地）去转悠，看看有无猎物（选题）值得捕获（深入进行采访）。不久，便发生了所谓“蝗虫起家”的故事。

著名物理学家丁肇中教授，在谈到他的人生经历时，曾对我说：“在中学读书期间，最使我怦然心动的是英国物理学家法拉第的道路，无论在成就、人品及背景方面，法拉第都称得上是一位伟大人物。他的背景很差，是个苦学生，这显示出一个人只要肯干，肯自强，普通人也可以有伟大

作者与老伴林风在新华社院内



的成就。”

我的经历当然不能与两位大科学家相提并论，但是，我的背景也很差，也是个穷苦学生，在新华社和国内外各科研机构这个大熔炉里，由于我珍惜这个机遇，肯干，自强不息，也取得了些许成绩。

我在新华社走上记者岗位以后，人们曾戏说我是从“蝗虫起家”开始记者生涯的。

那是20世纪60年代初，一个晴朗的夏日，我到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采访著名生态学家马世骏教授。马教授当时正在研究治理在中国为害多年的东亚飞蝗，他除了每年到洪泽湖、微山湖等蝗虫的孳生地考察以外，还在北京的实验室里喂养了许多蝗虫，为的是研究这种害虫的繁殖、生长规律，以便消灭它们。

马世骏是位身材修长、文质彬彬的中年科学家，他用带有山东口音的普通话，带我边参观边讲述了他从青年时代起立志研究消灭东亚飞蝗的感人事迹。采访中，他对我讲了有关这种所谓的“神虫”闻所未闻的故事。我不仅听他讲，参观他的实验室，还查看了一些关于中国发生蝗害的历史资料，不看则已，一看才知道，蝗虫在我国为害已有数千年之久。

据《五行志》上记载，唐贞元六年（公元785年）：

夏蝗，东自海，西尽河陇，群飞蔽天，旬日不息。所至草木叶及畜毛靡有子遗，饿殍枕道。秋，关辅大蝗，田稼食尽，百姓饥，捕蝗为食。

《元史》上又记载，元至正十九年（公元1359年）：

五月，山东、河北、河南、关中等处，蝗飞蔽天，人马不能行，所落沟壑尽平。八月己亥，蝗自河北飞渡汴梁，食田禾一空。

根据对甲骨文字的考证，我国有蝗灾的记载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蝗灾多半发生在黄淮海大平原上。解放前，每隔一两年便发生一次，常常与水灾和旱灾交错出现。水、旱、蝗灾，成为历史上三大严重的自然

灾害。据记载,近百年来就发生了三次毁灭性的大蝗灾。其中1929年发生的一次,全国受害的农田多达3600多万亩,飞蝗所到之处,田禾荡然无存。这年,在南京以东沪宁线的下蜀镇,蝗蛹掩盖了铁轨,使火车无法前进而误点。1938年,国民党政府炸塌了郑州附近花园口的黄河大堤,大片黄泛区成了蝗虫的孳生地,大批蝗虫轮番在十几个省市、近140个县迁飞为害,致使千百万人背井离乡,四处逃荒……

飞蝗给人们带来的深重灾难,深深地铭刻在少年马世骏的记忆里。长大以后,他考取了北平大学农学院生物系,立志研究和治理蝗虫及其他害虫。毕业后赴美国留学,在美国的4年间,完全靠半工半读,获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在美国,只要他愿意,金钱、地位、荣誉和爱情,唾手可得,可是,当各种诱惑都向他招手的时候,他想的却是如何尽快回国报效祖国。但是,一次次回国申请都遭到了拒绝。1951年,他利用去荷兰开会的机会,辗转到达伦敦,在伦敦的半个月里,他天天到大英博物馆拜访乌瓦洛夫,为的是向这位世界著名的蝗虫专家讨教灭蝗的经验和办法,回国后好对付正猖獗地危害农作物的东亚飞蝗……

随后,马世骏教授又对我谈了回国后的工作。采访中,我被这位中国生态学奠基人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过后,写了篇数千字的长篇通讯,经新华社对国内外播发后,1962年7月19日,《人民日报》在二版头条位置,以半版的篇幅,刊登了这篇由我署名的题为《揭开蝗虫生活之谜》的通讯。

文稿发表后,我没有停止与马世骏的交往,仍时不时地去他的实验室找他访谈,以期积累更多的素材,续写他的故事,不久,又写了长篇报告文学《归来三十个春秋》。

可是,在这之前,我面临的并不总是明媚的阳光,也有阴云密布、茫然不知所措的时候。

采访马世骏教授的第一篇稿件交给我的顶头上司方言后,在编辑的过程中,他做了认真修改。一天,刚上班,他当着全编辑部工作人员的面,一面把改过的稿子甩给我,一面厉声批评我说:“你叫编辑给你当校对,你连标点符号都不会标,还当什么记者!”

我接过稿子一看,不禁羞愧难当。那篇通讯虽然被《人民日报》在显

著的位置刊登了，但这并未使我高兴。

当时，我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再回到原来的单位做轻松的工作；再就是知难而进，不退缩。思想斗争的结果，我选择了后者。从这以后，我更加兢兢业业地做采访和写作工作。为了写的稿子不讲外行话，又通俗易懂，每次采访科学家时，我都坦率地对他们说，我对他们所从事的科学研究，是外行，而我又必须用通俗、生动的文字，将他们的经历和工作内容，生动准确地介绍给读者，因此，希望他们不仅能通俗易懂地首先给我“科普科普”，而且能不厌其烦地、详尽地谈谈我想知道的一切。当然，如果时间允许，我还要到现场采访……

事实一次次证明，我这种不自以为是、甘当小学生、不耻下问的诚恳态度，感动了采访对象，科学家们都是学有专长的大忙人，其中包括一些国内外著名的大科学家，听了我的申述和求助，他们无一例外地乐于帮助我。在采访写作过程中，正是因为我处处以科学家为师，以及编辑部同志的帮助和鼓励，才使我在记者的岗位上，顺利地完成了一次次艰巨的采写工作。

我当记者不久发生的一件事，一直铭刻在我的记忆里。20世纪60年代初的一天早晨，我走进编辑部，见我的顶头上司方言同志正在扫地，见我进来，他笑着用手里的扫帚打了我一下，高兴地说：“今天，《人民日报》在社论的位置（一版下面通栏）刊登了你写的通讯（即《盐碱地上好庄稼》）！”沉吟片刻，方言又说：“看来，过去让你当秘书干事，真是屈才了！”

听了方言同志的话，我赶忙找来报纸一看，见当天的《人民日报》在一版头条刊登了我写的中国农业科学院专家王守纯在豫北试验成功改良盐碱地的新闻，一版的下面以通栏的版面，刊登了署名“新华社记者顾迈南（我在新闻写作中一直使用的名字）”的通讯：《盐碱地上好庄稼》。

兴奋不已的我，从这以后更加努力勤奋地工作，我想，我是朱穆之社长亲自推荐的，又受益于严师方言的直接领导，我要再接再厉，用诚实的劳动为科学家们代言，为广大读者服务。

不久，更加艰巨的采访任务又摆在了我的面前：我国科学家在陕西蓝田发现猿人头盖骨，编辑部要我采访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副院长李四

光,请他们对这次重大发现发表谈话。

在这之前的1964年夏天召开的北京科学讨论会前夕,编辑部还要我采访几位著名科学家,其中包括著名的建筑史学宗师梁思成……

上述几位科学大家,在国内外赫赫有名,我这个年轻的、才疏学浅的小记者,不仅要和他们面对面地访谈,而且要在很短时间内生动、准确地写出采访记,并迅速地见诸报端,这显然是件极不轻松的工作,接受采访任务以后,我虽然不免有些忐忑不安,甚至惶恐失措,但是,我决定认真地面对,我决定做一只勇敢的小鸭子,上架了!

走上记者岗位之后,为了开阔视野,体验各地风情,我曾到三晋大地、呼伦贝尔草原和大小兴安岭采访,与当地的护林人、伐木工人、牧民促膝攀谈。那些日子里的采访见闻,就仿佛一幅幅风格迥异的风景画,镌刻在了我的记忆中。

1963年秋季的一天,我与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莎荫一道,从太原出

1996年作者与老伴林风、女儿林都平在澳大利亚悉尼海滩



发，来到辽阔富饶的晋南平原。在闻喜县东镇公社，采访了著名植棉能手吴吉昌。这次采访，是我做记者以后，第一次到农村采访，一路上所见所闻都觉得很新鲜。在田间地头、在吴吉昌的样板田里，听这位身材修长的农民土专家，用山西话讲述他和他的同伴们，为了提高棉花产品所做的种种不懈努力。

采访中，人们说，1963年春天，春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一天又一天，人们眼巴巴地望着棉花田，焦急地等待着棉田里的棉籽发芽，黄灿灿的小苗儿顶着冰凉的土，好不容易挣扎着出来了，但是，棉苗出得很不全，晋南专署全专区70%的棉田缺苗断垄，严重缺苗的就有30万亩。

正当人们一筹莫展的时候，晋南专署在吴吉昌的家乡召开了棉花保苗会议。会上，吴吉昌和山西省农科院运城棉花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给与会者传授了一种非常简便易行的新补苗办法——芽苗移栽。人们只需要拿一把小铲子，带上一壶水，到棉花地里把那些该间掉的苗儿刨出来，抖净了土，栽在缺苗断垄的地方就行了。那年，晋南地区的棉农就是靠它战胜了罕见的春季涝灾，在缺苗的棉田里移栽了十几亿株的棉苗。

人们面对着解放后第二个丰收的好年景，当热情的赞扬声向吴吉昌飞来时，这位憨厚的农民却说：“要不是棉花研究所同志们的扶持，我的经验是推广不开的！”

过后，我们又访问了运城棉花研究所，听科技人员讲述了他们和吴吉昌相结合，创造芽苗移栽的全过程。

采访过后，我心想，如果城里广大的科技人员能走出深宅大院，到田间地头来看看，听听农民对科学技术的呼声，那么，在中国辽阔的大地上，就会出现千千万万个吴吉昌，那该多好。于是，我怀着这样的想法，写下了长篇通讯《青出于蓝》，1963年12月9日《光明日报》等中央报刊，在显著位置刊出了新华社播发的这篇通讯。

在晋南地区的运城、临汾采访期间，我们除了住招待所外，还不时地住宿在农民的宅院里，和农民们吃住在一起。在饮食方面，使我至今难忘的是，在山西的农村和县城里，吃饭时，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都必须顿顿饭吃辣椒，因为在稀饭、米饭、馒头、包子中，可以说，辣椒无处不在。

采访中,另一个发现是,这里的农民家中,几乎每家都放着一口打好了的棺材。说起棺材,这种装殓死人的器物,我曾在黑夜里独自面对过。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一天黄昏,我随莎荫走进了一个农民的院子,主人把我和莎荫带进不同的两间屋子,一位全身穿着白色丧服的年轻妇女把我带进了一间放着一口大棺材的房子里,她把我的行李放到炕上,讲了几句我没有听懂的话,便匆匆走了。

那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的夜晚,窗台上的一盏小油灯,发出豆粒般蓝荧荧的光,院子里寂静无声,白天采访虽然累得够戗,但是,我躺在炕上却无论如何难以入睡,原因是身旁的那口棺材,使我浮想联翩。我猜想,那棺材里躺的死人可能是那位妇女的亲人,但究竟是她的什么人呢?是公公?婆婆?丈夫?

就这样在晋东南农村的这间小房子里,度过了一个难熬的、恐怖的不眠之夜。好不容易盼到鸡叫天明了,主人唤我去吃早饭,我这才如释重负。

吃饭时,我婉转地询问那位大嫂,棺材里躺着的是她的什么人?经莎荫翻译后,她对我说,那口棺材里,并没有人,是为她公公准备的,公公还健在呢!

“那你——”我的意思是,她为何身穿丧服?她听了,笑笑说,是为她的娘家爹爹穿的,她爹去世不久,她刚从邻近村子里的娘家吊丧回来。

我听了,心想:原来虚惊一场。

出于自尊心,谈话时,我未把昨夜的经历,以及自己吓自己的虚惊对在场的人们谈及。但也不免有些怨气,这怨气又不好意思明说,那就是这家主人为何把我这个异乡客安排在这么一个阴森森的、恐怖的房子,而又不说明缘由呢?继而一想,当记者是要经历种种艰难险阻的,采访中,并不总是被人待若上宾,要有适应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环境的精神准备,这也是对自己意志的磨炼。

在山西采访期间,我还到唐太宗李世民的点将台、崔莺莺与张君瑞热恋的普救寺参观访问,一路的所见所闻令我真切地感到:山西不愧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摇篮。

从山西采访回到北京不久，我又乘火车从北京出发，到达哈尔滨。

当时，北京正值夏末秋初，天气仍然炎热，而随着火车的向东北行进，凉意渐浓。到达哈尔滨时，天气十分凉爽，精神也振奋起来。然后我和新华社内蒙古分社记者秦继伦一起，走进了大兴安岭的森林里。一天，我们经海拉尔（吃了鲜美的手扒羊肉）从伊春出发，乘坐森林小火车边走边听向导讲述他们和“黑瞎子”（狗熊）周旋的故事。人在浩瀚的大森林里行走，就仿佛在海底行走一样，奇妙无比。远处不断传来伐木的电锯声、“顺山倒——！”的呼喊声。

伊春林业局的陪同人员告诉我们说，在这之前，刘少奇同志曾来林区视察过。他们说，森林里盛产松子，土豆也是主食之一。夜晚，我们被安排在有一面火墙的房子里歇息。白天，主人用拔丝土豆——白糖熬稀后，再放上削皮土豆块翻炒而成，以及森林里独有的各种美味款待我们。夜幕降临以后，听人们讲述伐木者的甘苦。采访时，首先端来炒松子供大家品尝。

一天，我们登上护林的小飞机，从林区空地腾空而起，跟随护林人巡视森林。顷刻间，飞机起飞以后，我从空中向下一看，大小兴安岭仿佛五颜六色的织锦地毯，红一片、白一片、紫一片、绿一片地镶嵌在起伏的山峦间，甚是美丽。我大概只顾了欣赏森林的美景，而忘却了身处险境——不停颠簸的小飞机，被阵阵气流打得忽上忽下，那位年轻的驾驶员是从空军转业来的，他一面开飞机，一面安慰我们说，不必惊慌，他们年复一年就生活、工作这样的环境里，有时，夏天电闪雷鸣时也要立刻起飞，到森林的上空查看有无雷击火出现，以便及时扑灭。

秦继伦同志上了飞机就呕吐不止，在空中他已经顾不得俯视森林的美景，而是紧闭双目缩在座位上盼着快点降落。下飞机时，他面色蜡黄，疲惫不堪，几乎是被人搀扶着才走出了机舱，他一再声明，再也不坐飞机了。

这次难忘的经历过后，我写了通讯《空中护林人》，经新华社播发后，被报纸采用。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是我还在中学读书时读过的

诗句，然而，只有到了大草原，置身于苍茫的环境里，身临其境，才能真正领略诗中的意境。

一天，我们乘坐吉普车在一望无际的呼伦贝尔草原上奔驰，蓝天白云下，但见一座座的蒙古包，就像一朵朵的大蘑菇点缀在碧绿的草地上。吉普车在无垠的大草原上飞快地奔跑着，我从汽车里向外眺望，偶见一两个牧羊人骑着高头大马在放牧，也许是这里的水草肥美，也许是周围没有任何障碍物，这里的羊跑起来，飞快，比在内地见到的圈养的羊强壮多了。

不一会儿，吉普车停在了一座蒙古包前，一位50多岁的蒙古族老妇人和她的膀大腰圆的儿子、孙子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当他们听说我们是专程从北京来到呼伦贝尔采访时，老妇人用蒙古语说道：“噢，你们是从毛主席住的地方来的！”

谈话间，他们用各种各样的奶制品款待我们，我们边喝着主人刚从帐篷——蒙古包外的奶牛身上挤下来的新鲜牛奶，边听他们讲述放牧生活。随后，她的儿孙们带我们来到草原上，给我们做了跨马表演，她那个8岁的孙儿，上马下马如履平地，他骑上大马，扬鞭奔驰，不一会儿，他那矫健的身影便消失在茫茫的草原上。

自那时以来，40多年过去了，我在新闻记者的岗位上，忙忙碌碌地奔波着，足迹可以说是遍布欧美亚澳各大洲，采访的著名人物不计其数，可是，三晋大地那些中华民族发祥地的遗迹，富饶的晋东南农村静静的夜晚，散发着花香、湿润宛如海洋的东北大森林，还有那苍茫辽阔的内蒙古大草原，始终滞留在我的记忆中，挥之不去。

现在回过头来看，一个涉世不深的年轻记者，要做好本职工作，开阔视野，深入到各种各样的环境里去采访，去体验生活，是完全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打下深厚的生活经历的基础，才能丰富自己的想象力。

年复一年，每当我的脑海里出现农村、森林和草原的画面时，祖国地大物博的自豪感便涌上心头，激励我奋进，甚至在海外采访，有人劝我留下来时，它都使我义无反顾地归来了。

2. 毛泽东与林一山谈三峡工程和南水北调

林一山关于三峡工程和南水北调问题与毛泽东面对面谈话的生动回忆，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林一山说：“在‘长江号’军舰上与毛主席的谈话，使我豁然开朗。毛主席的眼光、胸怀和气魄，确实与一般人不同，他从战略的高度，抓住了长江建设中最为关键的三峡工程和南水北调这两大课题。”

2008年1月5日，《人民长江报》第一版用整版篇幅发表了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的文章《一山独秀林不老 大江浩荡水长流》，记述了水利部原顾问、长江水利委员会原负责人林一山的事迹。

岁月如梭，如今林一山驾鹤西去已经两年多了。回忆和这位筚路蓝缕的水利专家也是儿女亲家的相识、相知，许多往事历历浮现在我的眼前，尤其是他关于三峡工程和南水北调问题与毛泽东面对面谈话的生动回忆，更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长江号”军舰上首次谈话

新中国成立后，林一山献身水利事业，曾先后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任、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兼党委书记、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简称“长